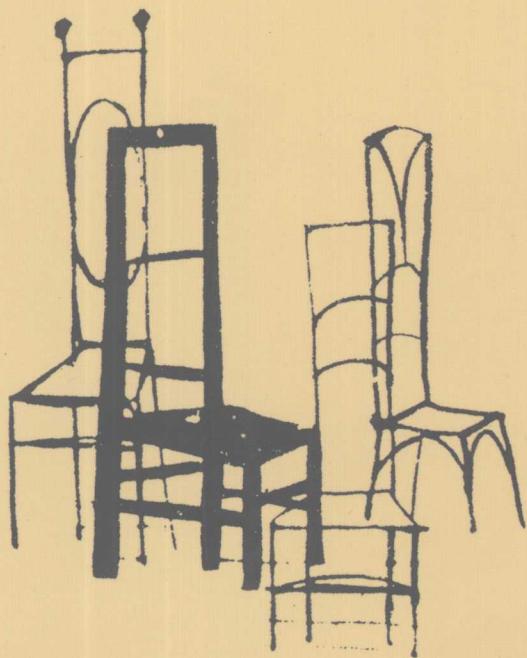


薛冰著

版本杂谈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版本杂谈

薛冰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版本杂谈 / 薛冰著. —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9.1
ISBN 978-7-80713-755-9

I . 版… II . 薛… III . ①版本 - 研究 - 中国 - 近代 ②版本 - 研究 - 中国 - 现代 IV . G256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0495 号

责任编辑 徐峙立

装帧设计 李海峰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规 格 150 × 228 毫米

20 印张 319 幅图 18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
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序

十年藏书热，故纸赛黄金。当今中国，越来越多的人奋身投入藏书大潮，上九天，下五洋，淘书觅纸。随着中国历史上第四次收藏高潮的兴起，古旧书潜在的经济价值浮出水面，得到社会普遍认同，其收藏地位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与历史上前三次收藏高潮不同，这一次的收藏主体，不再是皇室官僚，也不仅是专家学者，而更多的是平头百姓。民间收藏的蓬勃兴盛，预示着收藏活动正在由小众文化转变为大众文化，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收藏的前景，将是一片无比广阔的天地。

就藏书领域而言，现在的藏书人，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面。一方面，原先的爱书人，因为所选对象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，激起更大的收藏热情；另一方面，书价连年大幅攀升的趋势，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投资者，包括企业财团，时出大手笔；再一方面，一些初涉收藏圈的新手，以为旧书易得，投入不高，赝品尤少，也就放心地由此入门。不夸张地说，现在的古旧书市场上，真是什么书都有人去买、什么价都有人敢出。

图书收藏，与其他收藏领域一样，在摸索下海的阶段，有一些盲目性自是在所难免。有的人跟着兴趣走，有的人跟着市场走，有的人跟着传媒走，有的人跟着感觉走，只要能够自得其乐，也就无可非议。不过，一个人倘若真正有志在藏书领域中大显身手，那就或迟或早，总会去扣

版本学的大门。

版本学这门学问，并不玄虚，简单地说，就是弄清世界上大致有些什么图书，它们各具有什么样的形态，在出版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，并从中探究其特点与规律，以求对图书版本给予正确评价。由此自然也就明白，为什么某些书令人喜爱，某些书却让人不屑一顾；为什么有的书迟早会成为藏界的宠儿，有的书却永远难登大雅之堂。

传统的版本学，都是从图书的“人之初”开始说起，重点在宋、元，而延及明、清，论及清代道光以降的图书版本状况，往往以“衰退”二字一笔带过；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，即偶有涉及，也语焉不详。然而，今天的读者与藏书者有可能接触到的古旧书，基本上是近现代出版物；就是在拍卖场上，近现代出版物所占的比重也与日俱增，且多有不俗的表现。当代的民间藏书活动，最迫切需要的，就是在近现代图书版本上的指导。而令人遗憾的是，中国的正统版本学，恰恰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研究上，几乎是空白。

这种理论与实践的错位，固然有理论必然后于实践的因素，但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可能是更深层的因素。有的人误以为只有古籍才谈得上版本问题，版本学就是以古籍版本为研究对象的；有的人则认定近现代是中国图书版本的“衰退”时期，乏善可陈，自不足论。

笔者以为，所谓中国图书出版在近现代的“衰退”，只是一个基于雕版印刷技术的简单判断，并不符合出版史的实际。恰恰相反，十九世纪后半叶，西方印刷技术进入中国，此后一百余年间，是中国图书出版品种最为丰富、数量空前增加的时期，也是版本形态变化最为繁复、进步最为迅速的时期。

然而，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的讨论，多仍局限于具体与微观的角度，除了姜德明先生的《新文学版本》外，至今尚未见有人对中国近现代图书版本作宏观、系统、全面、规范地研究，未见有够分量的近现代图书

版本论著问世，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遗憾。

有鉴于此，笔者才不揣浅陋，下决心来撰写这一本讨论中国近现代图书版本的小书。

近现代一百年，是古老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。中国的出版业，同样也面临着一场脱胎换骨的巨变。西方现代印刷技术进入中国之后，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，与新技术有一个并存的时期，但在短短几十年之间，就急剧衰退，终至完全退出出版产业；照相石印和铅字排印成为中国图书出版的主流，西式的平装和精装也取代了传统的线装形式。这一变化对于中国文化启蒙、思想进步、社会发展的意义，不是本书所讨论的范畴；这里只强调一点，即图书版本形式的变化，是社会文明变化的重要表征之一。无视这种变化，轻视这种变化，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。

同时，这一阶段中不断革新的制版印刷技术，不断提高的图书装帧艺术，不断完善的版权保护办法，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图书版本形态。只要看一看本书的目录，就可以大致勾勒出这一百花齐放图景的轮廓。然后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随着电脑激光照排技术的普及与提高，印刷技艺又渐趋统一。出版史上这一“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”的轮回，暂时告一段落。对于今天的专业研究者，梳理这一切，都是相当严峻的课题。至于普通的读者和收藏者，面对这些问题，自然会有更大的难度。

所以，本书试图还版本学以实践学问的本相，希望它能成为一种普及性的具有直接参考意义的工具书，当然，也希望它能成为近现代图书版本学建设的一方引玉之砖，铺路之石。

本书定名《版本杂谈》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《近现代版本杂谈》。

在这本小书中，笔者尝试以版本学的基本概念为经，以图书实证为纬，编织近现代中国出版的宏观图景。虽然书中列举出大量实例，其目的并不在于孤立地对某种珍稀版本做鉴赏或评价，也无意于为书友们选择藏品方向出谋划策，而是力图从实例出发，说清近现代时期，大致产

生了哪些版本形态，各有什么特征，与此前此后的同类版本有什么联系与差异，在鉴赏、评判时应掌握什么标准，注意哪些问题，等等。也就是说，希望能够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总体状态及其沿革变迁的认识上，为读者朋友提供一些基本的方法，也提供一些参照的样本。

读书做学问需要了解版本，收藏图书同样需要了解版本，两者既有共通之处，各自的侧重点也有不同。本书虽侧重于图书的外在形式，当然也不可能完全不涉及图书内容与评价，以及著作者生平，出版者情况，流传与收藏等书前书后的故事。叙述的顺序，则大体依照图书生产的客观过程，即成稿、制版、印刷、装订、版权、装帧，最后是“书外之物”，据此分为七辑。凡前人论述较多的方面从简，反之则尽可能详备。

笔者不是版本学专家，写作的过程，也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探索的过程。

首先，由于近现代图书版本形态的丰富，远超出了传统版本学的旧有范畴，不但对原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，时有突破，也必然需要引入一批新的名词术语。好在版本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，原本就是从图书存在与发展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，故而笔者可以借助于约定俗成的概念，并试图对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，进行较规范的界定。至于这些概念的选择是否合适，阐释是否准确，都有待书友、尤其是专家的评判。

其次，笔者由所知所见的近现代出版物出发，分类归并，梳出头绪，理顺脉络，从而确定篇目，这一结构框架是否能够完整、科学地体现近现代出版的全景，也有待检验。

第三，对于所论及的每一种版本形态，主要从寒舍所藏中，提供具体的图书样本，选配适当的书影与图片，所以未必就是最典型的例证。

不过，本书毕竟源出于笔者淘书、读书三十年经验，对于在版本学实践中，哪些地方会发生疑难，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，可以说比较了解。因此，无论这本书在理论上如何稚拙与生涩，对于爱书、藏书的读者，或许更有现实的借鉴意义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|-----------|
| 1 | 序 |
| 1 | 手稿本与修改稿本 |
| 6 | 誊清稿本与编辑稿本 |
| 11 | 传抄本 |
| 16 | 影抄本 |
| 19 | 批校本 |
| 24 | 题跋本 |
| 29 | 修订本 |
| 32 | 日记和书信 |
| 37 | 家谱 |
| 41 | 文书 |
| 46 | 档案 |
| 50 | 雕版本 |
| 54 | 写刻本 |
| 58 | 重刻本 |
| 63 | 影刻本 |
| 67 | 增刻本 |
| 71 | 木活字本 |
| 75 | 拓本 |
| 79 | 红印本和蓝印本 |
| 83 | 套印本 |
| 87 | 后印本 |

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91 | 线装铅印本 |
| 95 | 石印本 |
| 101 | 珂罗版印本 |
| 105 | 影印本 |
| 110 | 名家手迹影印本 |
| 114 | 影印插图本 |
| 119 | 早期横排本 |
| 125 | 单彩印本 |
| 129 | 油印本 |
| 134 | 土纸本 |
| 139 | 摄影、晒蓝与复印 |
| 144 | 计算机激光照排 |
| 149 | 线装本 |
| 154 | 西式装订本 |
| 158 | 毛边本 |
| 162 | 精装本 |
| 169 | 软精装本 |
| 172 | 烫金与压空 |
| 175 | 同书的不同装订 |
| 179 | 开本 |
| 183 | 异型开本 |
| 188 | 版权 |
| 193 | 版权凭证 |
| 197 | 保密本与编号本 |

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203 | 内部发行 |
| 212 | 非卖品 |
| 217 | 自印本与准印本 |
| 223 | 征求意见本 |
| 229 | 征订样本 |
| 234 | 丛书零种与抽印本 |
| 239 | 印数 |
| 243 | 封面装帧 |
| 249 | 社标 |
| 254 | 扉页与环衬 |
| 258 | 正文版式与装饰 |
| 263 | 插图装帧 |
| 268 | 插图艺术 |
| 274 | 著者签赠本 |
| 279 | 书首赠言 |
| 283 | 转赠、代赠及其他 |
| 288 | 名家旧藏本 |
| 293 | 私藏趣印 |
| 297 | 馆藏印记 |
| 302 | 藏书票 |

手稿本与修改稿本

稿本，又称手稿，原稿，是图书著作者的原始文本，也是图书版本的原初形态。一个人著书立说，首先要写成稿本，然后才谈得上交付印刷出版。也有些稿本，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出版，便成为这一著述的唯一版本形式。尽管很多图书的稿本都已不存于世，但从理论上说，每一部书都是以稿本为基础的。所以论述图书版本，当从稿本开始。

稿本仍属较为宽泛的概念。在稿本的完成过程中，往往还会产生不同的版本形态。如有的著者在草成初稿后，要经过若干次修改，再定稿誊清，版本学中通常将这几类稿本，分别称为手稿本、修改稿本、誊清稿本。这当然也是一种理想程序。有的著者可能就在手稿本上进行修改，并直接将修改后的手稿本付印，所以在手稿本与修改稿本的具体区分上，有时也难以划出明晰的界限。即使一部图书曾经有过上述三种稿本形式，也未必都能流传下来。

不过，明确这几类稿本的概念，对判断认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稿本，是有意义的。

手稿本的用纸往往比较随便，书写也比较率意；有的装订成册，也有的就是散页。如佚名《国学举要·经学之部》稿，以毛笔竖写在九页十六开机制纸上，书法行中带草，十分洒脱，文中有较多涂改增删，修改字迹与原文相同，可以判定其为手稿本。而《先君院试文稿记》等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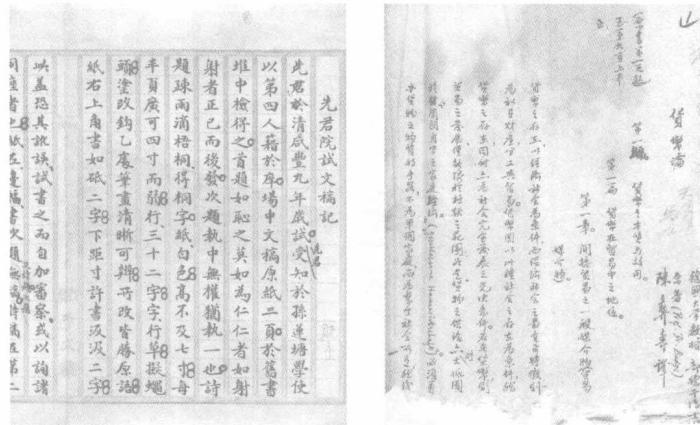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国学举要》

稿，以正楷书写于“顾予文稿”专用纸上，红色行格，半页九行，行十八字，断句处有圈点，只有个别字句的改动，稿纸且经托裱，当属修改稿本。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印的《顾顾予纪念文集》中可以知道，著者顾顾予生前曾“辑有《文集稿》四卷，惜在解放战争初期于南通县三余北撤途中遗失”，幸存的零稿俱已编入《顾顾予纪念文集》中。而上述稿本也是在此次印刷过程中流散出来的。

翻译稿是值得注意的一种近现代稿本。中国古代虽有翻译活动，但传统版本学因局限于古籍范畴，极少关注翻译稿。然而翻译稿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一环。笔者所得陈彝寿译《货币论》稿五十余页，以八开粉连纸，中分为两半页，毛笔竖写；书名下方标明“德国大学教授部德干博士原著，陈彝寿译”，并用括号注出著者德文姓名。文稿书写清楚，改动很少；在大标题“第一编 货币之本质与效用”的天头，注明“原书第一页起至第九页上半止”；在正文第一次出现“（原注）”处的天头上，注明“注意！凡原书中之注解，译文中皆用‘原注’两字标明之，而于正文段落后译注之。”由此可以断定这是译者交付出版的改定稿。译稿第一页上另有铅笔标出“26 / 3 / 6”，当是交付出版的时间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。

另一种近现代新稿本形态是记录稿。以记录稿成书，可以追溯到孔子的《论语》，但历来版本学中没有涉及记录稿这个概念。到了民国年间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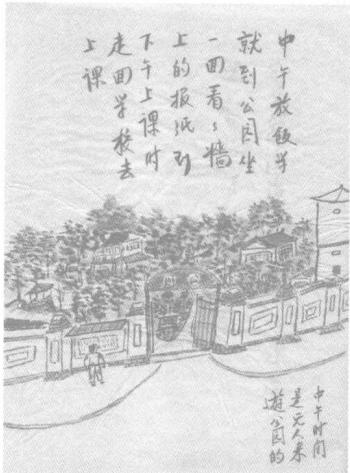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先君院试文稿记》

《陈彝寿译稿》

公开演讲成为社会活动与学术交流的常用形式，演讲者有时没有讲稿，有时脱离讲稿随意发挥，根据记录稿整理成文也就成为惯例。在条件许可时，记录稿会提交演讲人审定，这样形成的文稿可以视同为演讲人的著作。如《生长定律与产量曲线对于土壤肥力与施肥的关系》一文，全稿二十七页，红界行通用笺纸，以毛笔书写。篇名下方标“利查逊著，朱海帆译”，但文尾“注一”说明“本文系利博士在本所土壤肥料系学术讨论会讲演材料”。按利查逊博士是中央农业实验所英国顾问，抗战期间仍坚持在中国内地工作；朱海帆先生原供职于一九三五年成立的中央棉产改进所，一九三八年随该所进入中央农业实验所，为土壤肥料系研究人员，工作卓然有成；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后身即江苏省农科院，所以此稿会在南京散出。朱氏在整理时，有改写，有增补，贴有多处浮签；也有删去整段、整页的，且在天头上写明删除的原因。由此不但可以看到利氏讲演的原始面貌，也可以看出朱氏整理的原则和过程。

又如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和三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防空学校校长梁斌在中国人民大学做《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》的报告，笔者所见有两种记录稿，一种是同年四月五日的打印稿，一种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手写稿，打印稿对一些内容进行了模糊处理，但又有人用红笔做了多处补充，补充内容则出于手写稿。两稿相较，可以看出记录稿整理成文的反复过程。



最有趣的是配图稿本。因为文字作者未必能画，善画者又未必能文，所以图文并茂的稿本存世尤少。笔者偶得无锡袁子勤先生《童年坎坷》手稿，著者一九一八年生，家境贫寒，小学毕业后学徒，进入商界；一九五六年在上海商干校毕业，分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工作；一九六七年有机会回乡探亲，触动旧情，在当年八月写成此稿，约二万字，并以毛笔在二十四开大小的有光纸上，绘出“崇安寺及附近简图”、“惠山镇图”，及童年生活场景十九幅，装订为一册。袁氏文字平白如话，画笔稚拙，但真切地再现了当年无锡的民情习俗与市井风貌，是相当可贵的地方史料。

稿本的版本价值，首先在于它的唯一性。即使经过多次修改的稿本，每一次的修改稿也都是孤本；未曾刊印过的稿本，其版本价值就更高。其次，稿本在内容上，最接近著者的本意；从著者修改的过程，亦可以见出其思想的变化。第三，稿本是最可靠的校勘对本，可以用来校正印本的各种讹误。最后，稿本保留了著者的手迹，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，尤其晚清至民国年间的著者，在书法上都有相当的造诣；有的著者本身就是书法家，而稿本上的手迹往往与其书法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差别，反映出其书法的另一种面貌。

以往版本学专著中介绍的稿本，都是古代大名家的作品。大名家的稿本自然格外珍贵，只是现在多已收藏于图书馆与博物馆中，今天的读者能接触到原件的机会微乎其微。笔者曾在韦力先生芷兰斋中，得见柯

召恣《新元史》手稿，这该是历代正史稿本中惟一现存于世的，自属近现代手稿中的珍品。获得这种藏品的机会，真是可遇不可求了。不过事物都有两方面，不少名家稿本，都已编辑出版，有些且据手迹影印，或制作成电子版，治学者完全可以利用，同样也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。

所以笔者认为，今天的藏书家、爱书人，不必寄奢望于大名家的稿本，只要是内容有意义、书法尚可观的文稿，尤其是毛笔书写的文稿，都不应错过。一方面，民国年间的许多学者，今人已相当生疏，一时难以判定其学术地位。即如上述《先君院试文稿记》等，笔者在买下时也不了解著者顾覩予是何许人，只从文稿中看出他曾中过秀才，书法亦佳。后来读到《顾覩予纪念文集》，才知道他出身南通书香世家，是民国初年“通州四才子”之一；毕生从事教育工作，抗战期间坚守民族气节；工诗文，善书法。又如翻译《货币论》的陈彝寿先生，查过多种工具书都未见其名，后来通过网络，才查到他是浙江鄞县人，字虎尊，一九〇二年生，一九二一年后在法国里昂大学留学，曾任黄埔军校八期、十期德文教官；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其《农业政策》，一九六三年台湾“国防”研究院还出版过他所译菲希特著《道德学体系》。顺便说到，黄埔军校正是从第八期改变了传统的苏式和日式教育，采用德式教育，规定学生必须选学英、德、日三种外语中的一种，所以陈氏该是黄埔军校最早的德文教官之一。

另一方面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，图书的出版远没有近三十年这样滥，能够著书立说的人，大多是有相当学养根基的。就像《国学举要》这样的命题，著者能够举重若轻，提纲挈领，条分缕析，论国学造诣置诸名家之作中并不示弱。即使查不出著者的姓名身份，此类文稿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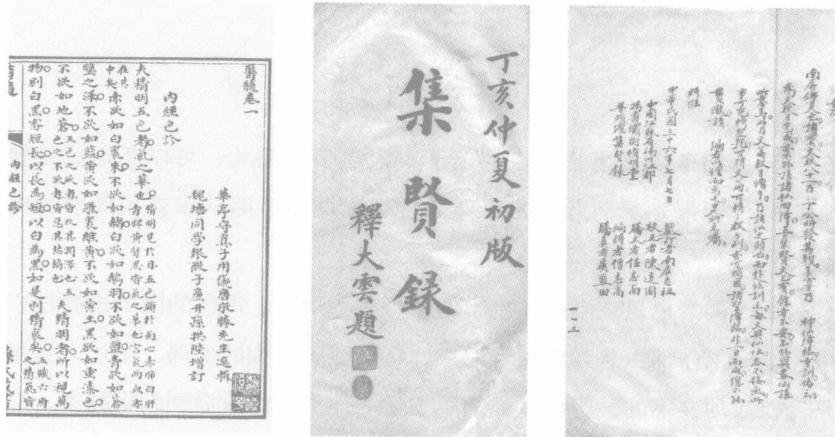
眷清稿本与编辑稿本

眷清稿本，也有人简称“清稿本”，但这容易被误认为“清代的稿本”，不甚妥帖。

眷清稿本一般是著者的定稿，也是交付印刷出版的底本，所以是与印本最为接近的稿本形态。眷清稿本有著者手自眷抄的，也有由他人眷抄的，但通常字迹较工整，装帧也较规范，很少写作、修改过程中留下的各种痕迹。这就使得眷清稿本很容易被混同于传抄本，不像手稿本、修改稿本与传抄本的区别那样明显，鉴别时尤须注意。

有些眷清稿本上，留下了著者的印章与题识，或者同时代人的相关题跋，都可以成为鉴定时的有力证据。利用已经确认的著者笔迹，与稿本的字迹进行比对，倘若两相吻合，则是最为可靠的依据。但更多的时候，稿本上直接提供的信息是不够充分的，这就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了。

笔者所得《医髓》四卷，前二卷内科，卷三女科，卷四周身部。全书以毛笔抄写于专用稿纸上，共一〇八页；墨印版框，高一八〇毫米，宽一三〇毫米，文武边栏，内无界行，这种黑框无格纸，在清代使用不多；版心内单鱼尾及下方“孙氏藏书”四字为印刷，鱼尾上手书书名“医髓”二字，鱼尾下手书各篇目；少数页有眉批，为同一人所书；书法一丝不苟，楷体而富隶意，亦有特色。据纸墨而言，时代应不迟



《医髓》卷首

《集贤录》扉页

《集贤录》版权页

于晚清。但由于书名页佚失，前后未见序跋，不能遽断。查相关工具书，仅见嘉庆间高玉如《医髓》二卷，未见著录四卷本《医髓》，方考虑此为誉清稿本而未刊行者。此书实为前代中医典籍的选编本，各卷首署“华亭守真子用仪唐敬胜先生选辑，魏塘同学银微子廉升孙拱陞增订”，结合版心“孙氏藏书”，则此稿应出于增订者孙拱陞之手；且书首“医髓卷一”四字下方，钤有“魏塘湛子”篆书白文朱印，也可以作为佐证。

另有《集贤录》一册，编著者自言开坛扶乩，收集到“十洲三岛五岳三山天宫地府圣佛仙真”降坛写下的劝善文字百余篇，分为三章，以墨笔抄写在毛边纸本上，高二三七毫米，宽一三五毫米，共一一五页，纸捻穿订，外包机制纸书衣。有趣的是，此书书名页明确地标示“丁亥仲夏初版”，书尾手书版权页的著录项相当规范，作上、下两栏，上栏是出版时间、出版者与书名：“时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七日，中国江苏省扬州江都扬寿坝修明堂普愿坛集贤录。”下栏是相关编辑人员：“鉴订者南屏老祖，校正者陈道图，誉文者任志面，编辑者僧志高，誉真者虞蓝田。”所以初看此本很像是抄本。然而题写书名页的释大云，署名下钤有“大云之印”朱文方印及“智定”白文椭圆朱印，正文中大云署名的两篇文章，也分别钤有这两方印；特别是《江苏江都扬寿镇普愿坛集贤宝录圆满之感想》一文，证明实际造作此书的就是